

再谈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

张懋镕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 本文认为叶家山曾国墓地是西周早期最典型、内涵最复杂、出土青铜器最多的姬姓诸侯国墓地。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形势的需要,此时的曾国成为第一等诸侯国。曾国不仅有很强的经济实力,而且已成为周王朝攫取土地与矿产资源的有力帮手。

关键词 叶家山 西周早期 曾国 墓地 青铜器

中图分类号 :K87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327(2016)03-0074-06

2012 年我们写过一篇文章《谈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1],那时候墓地还在发掘中。如今考古发掘基本结束,墓地面貌逐渐为世人所知^[2]。尽管详尽资料的公布尚需时日,但已经披露的情况让我们兴奋不已,下面想再谈一点粗浅的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曾国墓地的特殊性

西周早期诸侯国的墓地,已发现的有 1932~1933 年发掘的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1954 年及 1982 年发掘的江苏丹徒烟墩山宜国墓地,上世纪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发掘的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1978 年发掘的河北元氏西张村軻国墓葬,上世纪八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发掘的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上世纪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发掘的山西翼城天马一曲村晋国墓地等^[3]。相比之下,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具有与众不同的典型性与特殊性。

1. 最典型的西周早期姬姓诸侯国墓地。

以上所说的西周早期诸侯国墓地多被盗掘,或者只发掘了墓地的一部分,而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是唯一未被盗掘的发掘较完整的西周早期诸侯国墓地。具体而言,首先墓地的年代从周初到昭王时,这里至少安葬有相互衔接的三代曾侯(M65 的曾侯、M28 的曾侯谏、M111 的曾侯烝),不存在缺环。其次,发掘的 140 座墓葬,既有大型墓葬,也有中小型墓葬,墓地以国君墓为核心,墓葬级别大致依照与国君墓的远近来定,是一个完整的族墓地。再次,墓地的级别很高。举一个例子。叶家山曾国墓地中最大的一座墓葬是 M111(曾侯烝墓),为“甲”字形墓,墓室面积为 135.32 平方米(上口)~47.03 平方米(下口)。相比而言,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中最大的一座墓葬 M1193(燕侯克墓)是有四条墓道的大墓,墓室面积为 41.86 平方米^[4],平顶山应国墓地中最大的一座墓葬 M232(应公墓)是“甲”字形墓,墓室面积为 30.8 平方米(上口)~24.8 平方米(下口)^[5],北赵晋侯墓地中最大的一座墓葬 M114(晋侯燹墓)是“甲”字形墓,墓室面积为 37.4 平方米^[6],河南浚县辛村的卫国墓地中最大的一座墓葬 M42 是“甲”字形墓,墓室面积为 38.1 平方米(上口)~35.6 平方米(下口)^[7],都远远小于叶家山墓地 M111。如果将西周姬姓诸侯国国君的墓葬分成多个等别,那么应侯、晋侯、卫侯的墓葬只能算第二等侯墓,曾侯的墓葬就是第一等侯墓。曾侯烝墓是迄今发现的西周早期最大的姬姓诸侯国国君的墓葬。墓葬越大,墓地的级

接的三代曾侯(M65 的曾侯、M28 的曾侯谏、M111 的曾侯烝),不存在缺环。其次,发掘的 140 座墓葬,既有大型墓葬,也有中小型墓葬,墓地以国君墓为核心,墓葬级别大致依照与国君墓的远近来定,是一个完整的族墓地。再次,墓地的级别很高。举一个例子。叶家山曾国墓地中最大的一座墓葬是 M111(曾侯烝墓),为“甲”字形墓,墓室面积为 135.32 平方米(上口)~47.03 平方米(下口)。相比而言,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中最大的一座墓葬 M1193(燕侯克墓)是有四条墓道的大墓,墓室面积为 41.86 平方米^[4],平顶山应国墓地中最大的一座墓葬 M232(应公墓)是“甲”字形墓,墓室面积为 30.8 平方米(上口)~24.8 平方米(下口)^[5],北赵晋侯墓地中最大的一座墓葬 M114(晋侯燹墓)是“甲”字形墓,墓室面积为 37.4 平方米^[6],河南浚县辛村的卫国墓地中最大的一座墓葬 M42 是“甲”字形墓,墓室面积为 38.1 平方米(上口)~35.6 平方米(下口)^[7],都远远小于叶家山墓地 M111。如果将西周姬姓诸侯国国君的墓葬分成多个等别,那么应侯、晋侯、卫侯的墓葬只能算第二等侯墓,曾侯的墓葬就是第一等侯墓。曾侯烝墓是迄今发现的西周早期最大的姬姓诸侯国国君的墓葬。墓葬越大,墓地的级

别越高,阶层越复杂,就越有代表性。

2. 内涵最复杂的西周早期姬姓诸侯国墓地。

在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发现之前,诸如卫、燕、应、晋等诸侯国墓地的发现,皆因墓地所出青铜器铭文中上有卫侯、燕侯、应侯、晋侯等字样,与古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是一致的。即便如丹徒烟墩山墓地是否为宜国墓地,尚有讨论的空间,但也没有出现激烈的纷争,然而关于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的主人的归属问题,却引发轩然大波。少部分学者(包括墓地发掘者)认为此墓地的主人即西周早期的曾国国君—曾侯与周王室同姓,是姬姓^[8],但大部分学者反对姬姓说。反对者的理由也很充分,譬如整个墓地的墓向是东西向,墓主人头向东,与常见的周人墓向不同;譬如有些墓葬有腰坑,这又是殷人墓的特点;譬如墓地出土不少日名与族徽铜器,甚至在最大的一座墓葬—M111出土的曾侯铜器上也出现了日名“父乙”,而殷人惯用日名与族徽。更为复杂的是,这个用锄头挖出来的曾国,在古文献上却找不到^[9]。文献记载在随州一带的姬姓诸侯国是一个名“随”的诸侯国。李学勤等先生主张曾就是随。随着随州文峰塔墓地编钟铭文的问世,已有更多证据证明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的主人是姬姓。不过这个考古发现的曾国为什么就是文献记载的随国,依然缺乏直接的证据,所以还是有学者持怀疑态度^[10]。可以说关于西周早期诸侯国墓地性质的争论之纠结,莫过于叶家山曾国墓地了。

3. 出土青铜器最多的西周早期姬姓诸侯国墓地。

由于叶家山墓地没有被盗,加之墓地规模宏大,所以出土器物很多,在2000件组以上。有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漆木器、玉器等。就青铜器而言,除了出土大量常见的器类、器物外,还出土其他诸侯国墓地少见或不见的钟、罍与铜铎。下面以青铜器为例,看看曾侯青铜器有何胜出之处。

方鼎:叶家山M111出土曾侯作父乙方鼎,

通高49厘米。关于此器的重量,相关资料没有公布,但无疑曾侯作父乙方鼎是目前所见体量最大的西周早期诸侯国国君的青铜器。有盖,盖上的夔龙形扁钮很特别,且器上布满纹饰。传世康侯丰方鼎通高27.8厘米,重5.16千克。布满纹饰。(商周01575)^[11]晋侯墓地M114出土叔父方鼎,通高27.厘米。布满纹饰。(商周02419)

分裆鼎:叶家山M28出土曾侯谏分裆鼎,通高22.5厘米,重2.31千克。布满纹饰。传世应公分裆鼎两件,一件通高18.0厘米,重1.75千克。仅口沿下饰两道弦纹。一件通高18.4厘米,重1.69千克,器腹饰兽面纹(商周01430、02071)。传世燕侯旨分裆鼎通高20.4厘米,重1.9千克。器腹饰兽面纹(商周02203)。鲁侯分裆鼎两件,通高分别为22.5、23.0厘米。有盖。仅口沿下饰两道弦纹及蝉纹(商周01573-74)。

圆鼎:叶家山M65出土曾侯谏圆鼎,通高28.9厘米,重3.98千克。仅口沿下饰涡纹及夔纹。传世燕侯旨圆鼎通高17.2厘米,重1.16千克(商周01716)。仅口沿下饰简化兽面纹。

鬲:叶家山M28出土曾侯鬲,通高15.5厘米,重0.78千克。口沿下及腹部有纹饰。1927年陕西宝鸡戴家湾墓地出土鲁侯熙鬲,通高17.1厘米(商周02876)。口沿下及腹部有纹饰。

簋:叶家山M65出土曾侯谏簋,高17.5、口径22.4厘米,重3.53千克。颈部、圈足、耳上有纹饰。丹徒烟墩山出土宜侯矢簋,高15.7、口径22.5厘米(商周05373)。布满纹饰。传世燕侯簋通高12.8厘米,口径17.8厘米。颈部及圈足饰两道弦纹(商周04440)。传世应公簋两件,一件高12.8厘米,重2.14千克,口沿下饰一周夔纹(商周04210)。一件高12.5厘米,重2.33千克。口沿下仅饰两道弦纹(商周04211)。

盃:叶家山M28出土的曾侯谏盃,通高30.0厘米,重4.59千克。盖与器上布满纹饰,装饰华丽。琉璃河M1193出土燕侯克盃,通高26.8厘米。盖沿及颈部饰鸟纹一周(商周

14789)。

罍:叶家山 M28 出土的悬铃罍通高 44 厘米,重 7.40 千克。虽然这件罍上没有曾侯的字样,但这样高大的器物应为国家所专用。通体布满纹饰。琉璃河 M1193 出土的燕侯克罍通高 32.7 厘米,盖与肩部饰涡纹(商周 13831)。

壶:叶家山 M111 出土带盖曾侯壶,通高 40.3 厘米。此器单盖带流,很少见。M65:曾侯壶,带提梁高 44 厘米,重 5.94 千克。盖与器上均有纹饰。M28 出土曾侯谏作媿壶,通高 46.5 厘米,重 3.31 千克。除了盖与颈部饰夔龙纹一周外,在器盖捉手、口沿下及圈足上均有红黑相间的彩绘,腹部印有规整的竹席痕迹,很有特色。传世应公壶通盖高 27.1 厘米,重 2.79 千克。仅盖沿与颈部饰两道弦纹(商周 12171)。

卣:叶家山 M111 出土曾侯卣,通高 36.0 厘米。提梁、盖上、口沿下及圈足有纹饰。M28 出土曾侯谏作媿卣,带提梁高 43.4、通盖高 39.6 厘米,重 7.85 千克。提梁、盖上、口沿下及圈足有纹饰。传世应公卣通高 20.8 厘米,重 2.7 千克(商周 13049)。提梁、盖上、口沿下及圈足有纹饰。

尊:叶家山 M28 出土曾侯谏作媿尊,通高 30.2、口径 24.0 厘米,重 4.49 千克。腹部装饰多条纹饰带。传世鲁侯尊通高 22.2、口径 20.7 厘米,重 4.1 千克(商周 04955)。通体光素。

综上所述,与卫、燕、应、晋、鲁等姬姓诸侯国国君的青铜器相比,曾侯的青铜器不仅要高大许多,而且装饰也要华丽一些。虽然西周早期卫、燕、应、晋、鲁等姬姓诸侯的青铜器由于种种原因,发掘与存世的器物不多,但依据前面所述燕侯、应侯墓葬规模逊于曾侯犴墓葬的事实,卫、燕、应、晋等姬姓诸侯与曾侯青铜器之间存在着差距,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有些曾侯青铜器如方鼎、壶、卣要比卫、燕、应、晋、鲁等姬姓诸侯的器物高出十几甚至二十几厘米,说明它们不在一个阶层上。卫、燕、应、晋等姬姓诸侯之间的青铜器体量与装饰比较接近,在同一层次,而曾侯青铜器尤其是曾侯犴的青铜器可能要高出一个层次。如果此说不错,那么

曾侯尤其是曾侯犴的实际地位要高,曾国乃西周早期第一等重要的姬姓诸侯国^[12]。

二、第一等诸侯国形成的原因

西周早期的曾国,缘何成为第一等重要的姬姓诸侯国?实在是当时政治形势所使然。

以往的文献与考古资料告诉我们更多的是武王、成王如何经营东方,却较少披露当时周王朝对南方的重视程度。李学勤先生在《太保玉戈与江汉的开放》一文中,依据《诗经》、《史记》的记载,并结合周原甲骨文有“楚子”的记事,太保玉戈有周王“令太保省南国”文句,敏锐地指出:楚的分封说明“周人的影响从文王时已南及江汉”,到了武王、成王时,召公的南国之行对南土的开发起了较大的作用^[13]。

确实如此。当周公、成王东征之后,东土开始平静,广大的南方地区就成了周王朝主要关注的对象。随州文峰塔出土的曾侯與钟铭曰:“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李学勤先生据此认为周王让第一代曾国国君统领江汉地区,和授予第一代齐国国君齐太公“五侯九伯,汝实征之”的权力差不多^[14]。随着昭王南征的开始,曾国的地位也愈发显得重要。M111 墓葬规模之大,出土器物之多,青铜器之伟岸精美,都印证了这一点。

此时曾国的军事实力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M111 出土多少兵器,未见报道,而小于 M111 的 M28 出土兵器 265 件,可知 M111 会有更多的兵器。譬如 M28 出土特大青铜錫一件,径长 31 厘米,大型錫九件,径长 20 厘米, M65 出土大型錫五件,径长 29.8 厘米,而最大的一件燕侯舞錫,径长才 15.2 厘米(商周 18488)。M28 出土最大的一件戈通长 25.2 厘米,燕侯戈通长 22.3 厘米(商周 16389)。M65 出土戟 3 件,通长 23.3 厘米,燕侯戟通长 22.0 厘米(商周 16596)。

第二,曾国有很强的经济实力。曾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较高,生产力的高低取决于生产工具,而在青铜时代,则与青铜工具的使用关系密切。从 M28 出土两块铜锭证明这里拥有

充足的铜原料^[15]，不仅可以铸造大量青铜礼器，而且有余力来铸造青铜工具、农具。叶家山墓地出土了不少青铜工具，如 M28 出土斧 1 件、钺 1 件、镞 2 件、凿 2 件、刻刀 2 件。M65 出土镞 1 件。M1 出土削 1 件。青铜钺的出土引人注目，作为一种取土工具，发现很少。在燕国与应国墓地也出土工具，如 M1193 燕侯墓出土斧 1 件、镞 1 件、凿 3 件，M232 应公墓出土斧 1 件、镞 1 件，M230 应侯墓出土斧 1 件、镞 1 件，M229 应史墓出土镞 1 件，数量不及曾国墓地，而且也没见青铜钺。对于斧、镞，可以解释为用来修理战车，但钺是套在木耜叶上的，一定是用来耕地的，是一种重要的农业器具。农业是立国之本，青铜钺的出土有助于说明曾国的农业发展水平。

第三，曾国已成为周王朝攫取土地资源与矿产资源的有力帮手。在西周早期，经过武王、成王、康王封建诸侯，到昭王时，可用于分配给贵族的土地已经很少了，周昭王南征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攫取更多的土地。纵观西周一代，赏赐土地以昭王时为最多。通过南征，昭王将新得到的土地分给南征将领。如在静方鼎铭文中，就有王赏赐静采地“罍”的记载。在中作父乙方鼎铭文中，中得到的赏赐也是采地，在福这个地方^[16]。在作册折觥、尊、方彝铭文中，都说到周王命令作册折（也是一位南征将领）将望土赏赐给相侯。还有赳尊铭文也提到王赏赐赳的采地叫“赳”。这些采地都在南国范围内，是朝廷通过殖民扩张新得到的土地。拥有更多土地，对于保障贵族的生活质量，促进王朝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一切显然要依靠江汉地区的第一大国——曾国了。

获取铜料同样是重要的事情。兹罗列与昭王南征有关铭文。

1. 过伯簋：“过伯从王伐反荆，孚（俘）金，用作宗室宝尊彝。”（《商周》04771）

2. 小子生尊：“唯王南征在斥，王令生办事于公宗，小子生锡金、郁鬯，用作殷宝尊彝。”（《商周》11799）

3. 师余尊：“王如上侯，师余从。王掖功，锡

师余金。”（《商周》11794）

4. 作册折尊、方彝、觥：“唯五月，王在斥，戍子，命作册折，望土于相侯，锡金、锡臣，扬王休，唯王十有九祀，用作父乙尊，其永宝。木羊册。”（《商周》11800、《商周》13542、《商周》13665）

5. 启尊：“启从王南征，迺山谷，在泇水，启作祖丁旅宝彝。”（《商周》11778）

6. 启卣：“王出猷南山，搜迺山谷，至于上侯，澆川上，启从征，谨不扰，作祖丁旅尊彝，用勺鲁福，用夙夜事。戍籛。”（《商周》13321）

7. 鬲簋：“鬲从王伐荆，孚（俘），用作鬲簋。”（《商周》04585）满花器。

8. 狄驭簋：“狄驭从王南征，伐楚荆，又（有）得，用作父戊宝尊彝。”（《商周》04895）

9. 该簋（两件）：“唯九月，鸿叔从王南征楚荆，在成周，该作宝簋。”（《商周》04866-67）

10. 该鼎：“鸿叔从王南征，唯归，唯八月在噩，该作宝鬲鼎。”（《商周》02169）

11. 静方鼎：“唯七月甲子，王在宗周，命师中，罢静省南国相，鬲。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亥，王在成周太室，命静曰：‘俾汝司在曾、鄂师。’王曰：‘静，锡汝鬯、旅、市、采。’曰：‘用事。’静扬天子休，用作父丁宝尊彝。”（《商周》02461）

12. 中方鼎：“唯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次，王命太史祝福土。王曰：‘中，兹福人入事，锡于武王作臣，今祝畀汝福土，作乃采。’中对扬王休命，鬲父乙尊。唯臣尚中臣。”（《商周》02382）

13. 中方鼎（两件）：“唯王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省南国，贯行，鬲王，在夔鬲真山，中呼归生夙于王，鬲于宝彝。”（《商周》02383）

14. 中鬲：“王命中先省南国，贯行，鬲在曾，史儿至，以王命曰：‘余命汝使小大邦，……中省自方、邓，夔口邦，在鄂师次，……用作父乙宝彝。’”（《商周》03364）

以上 18 件南征将领的青铜器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1.与“金”有关 过伯簋、小子生方尊、师觶尊、作册折尊等器铭文告诉我们由于南征有功,昭王直接将金(铜锭)赏赐给将领们。鬲簋、狄驭簋铭文只是说有得即有所获得,但不具体,可能包含多种赏赐品,而铜锭大约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作战的主要目的是攫取铜原料。还有一些金文如谿鼎、中甗铭文,没有谈到这些南征将领受到何种赏赐,是否获得铜锭,但从他们所作器物的精美及厚重程度来看(下详),可能是获得了铜锭。

2.器型特别 青铜器发展到西周昭王时期,方鼎、方彝、觥已成稀罕之物,而以上18件青铜器中就有4件方鼎、1件方彝和1件觥。在3件青铜簋中,除狄驭簋没有图像,不知其形制外,其它两件有图像,但形制也很特别,过伯簋是一件方座簋,而鬲簋圈足下有4条象首鼻形足。3件青铜尊的形制也不同,尤其是小子生方尊的圈足为方形,腹两侧且有象鼻形螭,十分少见。

3.器物高大厚重 作册折尊通高32.8厘米,重7.88千克;小子生尊通高40.27厘米,19.01千克;作册折方彝通高41.6厘米,重12.8千克;作册折觥通高29.2厘米,重7.52千克。谿簋两件,通高25.5厘米,重6.7千克,在昭王时代的方座簋中可能是最重的一件。西周早期成康之时,承绪殷商余韵,尚有比较高大厚重之器,到了昭穆时期,器物渐趋低矮轻薄,但昭王南征将领的器物却是例外。

4.装饰华丽 过伯簋口沿下饰云雷纹衬底的卷尾回首鸟纹,颇为精细。小子生尊、谿簋两件以及作册折尊、方彝、觥都是满花三层器,线条生动流畅,富丽堂皇。中的另一件器物——中觶(《商周》10658)的腹部装饰四个手指纹,堪称奇绝。

5.铭文多且长 昭王南征将领的青铜器多有铭文,而且在同时期、同类器中铭文较长。静方鼎铸铭77字,是西周早期铭文最长的方鼎。中甗铭铭文98字,是西周铭文最长的青铜甗,自北宋出土之后,一千年来尚无有比肩者。作册折方彝器盖同铭,各42字,是西周早期仅次

于矢令方彝的铭文最长的方彝。作册折觥是器盖同铭,各42字,是商周时期铭文最长的觥。中觶器盖同铭,各36字,则是西周早期铭文最长的觥。

综上所述,昭王南征青铜器不仅铸造精良,而且高大厚重,铭文很长,在西周早期青铜器中十分亮丽,足以说明其器主即南征将领异乎寻常的地位与身份,他们受到周王的特别青睐,体现出周王朝对于南征的高度重视,当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铜料资源的相对充裕。昭王以后,西周青铜器有了很大变化,穆王时期的青铜器的高度与重量普遍不如昭王时期,这不能不说与昭王南征失败后铜原料的获得变得艰难有关。

昭王南征的路线,即所谓的“金道锡行”:一条从成周(洛阳)出发,经鲁山一带,过南阳盆地,入随枣走廊到随州;一条从长安(丰镐)出发,经蓝田、商洛、襄阳、枣阳到随州。在昭王南征铭文中常见王在成周,可知前一条路线很重要。两条路线都集结于随州,曾国所处位置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

或以为昭王南征之后,曾国受到致命打击,其实不然。从宋代安州出土六器(中方鼎、中甗等)来看,在周昭王去世后,中作为南征将领,依然驻军在安陆一带。说明昭王南征之后,周人并非败得一塌糊涂,至少还固守着一些据点。况且《古本竹书纪年》也谈到昭王的儿子穆王也曾对南方用兵;“南征亿有七百三里”^[17]。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现西周中期的曾国青铜器,但西周晚期的曾国青铜器是有的,如曾太保簋2件(集成04054)、曾伯文簋3件(集成04051-53)、曾伯文罍(集成09961)、曾伯父穆鬲(集成00699)、曾仲盘(集成10097)。在一部重要的古书《国语·郑语》中,记载周幽王时期的史官——史伯对郑桓公论说当时周朝形势的一段话,他说“当成周者,南有荆蛮(楚)、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可见西周晚期时曾国(即随国)还在。虽然到了战国早期曾国依附楚国,但曾侯乙墓的宏大及出土器物之惊人,还是展现出—一个曾经是西周诸侯大国的风

貌。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叶家山曾国墓地的考古资料仅发表了一部分,所以本文的依据并不充分,尚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完善。

注释:

[1]张懋镕《谈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原载《出土文献》第三辑,2012年《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5~20页。

[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1期,第4~60页;《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2012年第7期,第7~52页;《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第二次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3年第3期,第3~6页;《湖北随州叶家山M28发掘报告》《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第3~57页;湖北省博物馆等《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本文所引墓地资料均出于以上考古报告,不再一一注明。

[3]李学勤《西周时期的诸侯国青铜器》《新出青铜器研究》第30~37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第21页。

[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平顶山应国墓地》(上),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18页。

[6]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文物》2001年第8期,第6页。

[7]郭宝钧《浚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年,第10页。

[8]李学勤《新见楚王鼎与“曾国之谜”》《青铜器入门》,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40~144页。徐少华《论随州文峰塔一号墓的年代及其学术价值》《江汉考古》2014

第4期,第80~82页。黄凤春《关于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问题》,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叶家山西周墓地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第5页,2013年12月。张懋镕《谈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5~20页。

[9]李伯谦等《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第二次发掘笔谈》《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第58~63页。

[10]请参阅《江汉考古》编辑部《“随州文峰塔曾侯与墓”专家座谈会纪要》中张昌平教授的发言,《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第59~60页。

[11]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简称《商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12]黄铭崇在《从湖北叶家山墓地与邻近地区墓葬青铜器的礼器制度类型看西周早期的“南国”大势》中认为“曾国”是周王朝南国第一级的大国,“叶家山西周墓地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3年12月,第105页。

[13]李学勤《太保玉戈与江汉的开发》《中国文物报》1993年3月7日《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5~141页。

[14]李学勤《曾侯與编钟铭文前半释读》《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第69页。

[15]2015年3月27日,黄凤春先生来陕西师范大学作“随州考古新发现与古曾国”的演讲,透露一个信息: M111的遗物在打包回来的清理中发现一块铜铎,比M28的铜铎还要大。这不仅进一步证明曾国拥有丰富的铜料,也有助于说明在叶家山曾国墓地,铜铎已经成为墓主身份地位的标志物。

[16]张懋镕《静方鼎的史学价值》《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45~46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略说对周昭王南征的评价》《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78页。

[17]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2~33页。

Re-discussion on the Zeng State's Cemetery of Western Zhou in Yejiashan Site, Suizhou

Zhang Maorong

(Xi'an Shaanxi 710119)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Zeng State's Cemetery of Western Zhou in Yejiashan Site is a typical burial of the Zhen state. The most complicated and abundant bronzes in the vassal states with the Surname Ji were uncovered here. Zeng should be considered a major vassal state during the Zhou dynasty due to its particular geography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Zeng not only possessed strong economic power, it was also an asset to the Zhou Court in territorial expansion and a major supplier of metal ores.

Keywords: Yejiashan Site, early Western Zhou period, Zeng State, cemetery, bronze

(责任编辑、校对:陈丽新)